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心理學（第二輯）

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

孩童的心理教養法

〔美〕華生 (J.B. Watson) 著 惠迪人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二辑）

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

孩童的心理教养法

〔美〕华生（J.B. Watson）著 惠迪人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童的心理教养法/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心理学)

ISBN 978-7-5520-1767-0

I. ①孩…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心理学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38号

孩童的心理教养法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67-0/B.176

定价: 60.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華生（J.B. Watson）著 惠迪人 譯

孩童的心理教養法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致謝

這本小書能够與讀者相見，我首先便要感謝潘菽先生。他化了許多的時光爲我的稿本校改了兩次，使我這個並非專習心理學的人能把這本書貢獻給國人。如果這本書對於兒童的家庭教育有一點幫助和實益，那完全是他的賜與。

其次我要致謝的是羅志希先生。得了他的介紹，使我這本小書有出版的機會與可能。此外如米君養明、萬君方、謝君、呂君寶全及我妻寶雲等，均曾給我這本小書許多協助，一並在此致謝。

二十三年八月——譯者

序言

動物的進化和幼穉期的延長相並行，社會的進步也和對於幼穉者的教養的重視相並行。如何訓練幼穉者以適合並控制現實的和改變中的環境，這是人類所有最重大的事業。在這種事業中，人類找到了控制他自己前途的命運的一個主要的方法。

當一個民族到了對於自己——尤其對於幼穉者——也不愛惜珍重的時候，那個民族一定是衰落不堪，一切文化的企圖都談不上了。政治和教育是推動社會的兩個輪子。從一個社會對於幼穉者的教養所有的考慮和所費的勞力，可以知道這個社會的健康狀態和前途的希望。

中國現在正處於一種極危迫的情境之中，須要大大的控制自己以圖生存。就教育一端而說，我們不僅須要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培養。所最須要的尤其是社會生活的訓練。中國所須要的教育，應該較現在所有的具有一種更根本更徹底的意義。這就是說，中國的後進者在行為習慣方面須要徹底的改造。又我們不僅須要學齡期的教育；我們並且須要學齡前期的教育。兒童到了六七

歲可以進學校的時候，許多基本的習慣已根深柢固的養成。教育者在這時所能做的至多不過是一些表面上的改變和修飾，對於兒童整個的品性已難能為力。打鐵要在初出爐子的時候，耕種要在雜草還未萌生的時候。中國的教育如要產生一點轉移社會的力量，非改變方向多多注重嬰兒期的育養不可。

在這樣的觀點之下，Watson 的這本書是特別值得介紹到中國來的。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有價值的提示，發見許多關於教養兒童的而為我們平常所想也沒有想到的問題。這種問題雖為我們一般所忽視，但卻是兒童教育的基石。又最重要的是著者告訴我們一些控制兒童的行為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實驗室裏所試出來而實際行之有效的，不是憑着理論或個人的意見所定下來的可比。

這不是一本理論的書，不是一本泛泛的討論兒童教育的書，乃是一本實際指導的書。亦許有人要覺得裏面所討論的事情未免流於瑣碎。但這正是這本書所有的一種特殊的價值所在的地方。關於實際問題的指導，我們所最須要的是具體的例示。假如有什麼一般的原則也必須在具體

的例示中纔能清楚的說明。從這書裏面的似乎瑣碎的討論，正可以看出教養兒童確是一件很精細的工作，處處須要留意的。

這本書的價值，在出版後已很迅速的爲我國學術界所認識。四五年來已有好幾種翻譯本子。黎明書局有一種（章益藩路基合譯），國聞週報刊佈一種（黃鈺生譯），商務印書館有一種，尚未出版，恐怕稿子已被燒去，另外聽說還有一種不知何處出版。現在惠迪人君的譯本是第五種了。據我所知道，沒有任何外國的著作曾被中國人翻譯得這樣起勁。此外雜誌和報紙上也常常看到討論兒童教育或情緒教育的文章，都是介紹或根據 Watson 的研究的。

惠君起初着手翻譯這本書的時候，並不知道已有其他的人從事翻譯，所以他的動機並不是要和別人爭勝。他不過覺得這本書確有介紹到中國來的價值——尤其是不知教養兒童爲何事的中國——所以他便着手翻譯了。我覺得惠君的翻譯方法是很忠實的，凡原本的聯句和語氣可以保存的地方都儘量的保存。其實這是翻譯的唯一方法，否則便不能算是翻譯。所謂「信」「達」「雅」的三個原則，只有信和達是須要的，有許多人的翻譯因爲要雅，反而弄得不信不達。所以雅不

但不須要，並且不應該作為翻譯的一個標準。假如真能做到信和達，雅便不成問題，除非是原文有毛病。至於信和達我以為也有連帶關係的。不信決不能算是達，不達也不能算是信。所以翻譯的唯一標準只有忠實於原本。惠君的這部譯本，對於忠實這一點總算盡了十分的努力，對於信和達雖然不能說已充分的做到，但我敢說已達到很高的程度了。因為如此，所以雖然已有好幾種譯本，我還是很慫恿惠君把他的譯稿想法出版。一種著作而有幾種譯本，這是翻譯界常有的事何況 *Watson* 這本書是這樣重要，而惠君的譯本也有牠的特殊的優點的。

最後我還有和原著者的一個同感，就是教養嬰孩的事情假如要做得好，除非有專門的組織——如育兒所之類——不可。各個的家庭是很難信賴牠們去好好的教養兒童的。不過現在我們只有家庭而沒有專門的育兒組織，所以更應該在家庭中盡我們力之所能做到的。嬰孩的教養不是一個家庭問題，而是社會與國家的一個重大的任務。質之讀者，以為然否？

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潘菽於中央大學。

導言

自從我第一次看到何爾突博士所著『兒童的哺育與照料』(Dr. Holt,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Children)那書以後，我便常想什麼時候能寫一本關於兒童心理方面的照料的書。那時我相信這種心理方面的照料，正和生理方面同樣需要的。近來在某方面我相信這是更加重要了。健康的兒童確能在極不同形式的哺育和身體的照料中成長起來。他們可以受不良營養和疾病的阻礙，可是經過幾天適度的管理以後就可以恢復他們的體重和體力了。

但是在幾天之內由於不良的管理而一次把兒童的性格弄壞了，誰能說所有的傷害是可以修補的呢？

我知道這本書對於心理方面，是不如何爾突博士對於身體照料方面那樣完備，但行為學者至今尚不十分知道如何可以做成一種完全滿意的工作。我們纔剛剛開始相信有關於兒童與嬰孩的心理方面的照料這回事而已。

現在還有很多母親不高興有人告訴他們怎樣哺育兒童。她們的祖母不會有十四個小孩而養活了十個嗎？她們自己的母親不是有六個或八個小孩都養大了——而她們從未需要一個醫生去告訴她們怎樣哺育嗎？至於祖母的孩子們有許多長得有佝僂病，有壞牙齒的，有營養不足的身體，總之容易害各種各樣的病，對於那不願意聽怎樣科學地去哺育孩子的話的母親，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很多母親，已覺得何爾突博士的書裏有些話是與聖經有同等價值的了。他的書已出到二十八版便是充足的明證。

父母們——尤其是母親們——對於怎樣在心理方面照料小孩的忠告和指導表示更強烈的反感。為什麼做父母的還須要關於他們應該給多少愛情與兒童這種忠告，或關於在家裏一天到晚應該怎樣管理和處理他們的兒童的任何這類話呢？『我不能把我的孩子抱在膝上，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同睡在一起！我不能隨意讓孩子在我身邊頑皮，假如我要時我也不能打或罵他！我須得在他一生下來就告訴他關於性的事情！誰曾聽過這種話呢？』不要以為這是一種落伍的態度，在每一都市、鄉村和城鎮的大街上你所遇着的正都是這樣的父母們。你可以在大學教授，甚至於小